

九一八事变研究综述

张劲松 马依弘

我国史学界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虽然起始于50年代，但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了深入的进展，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现将这一专题的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

建国后至文革前，国内史学界关于九一八事变研究的主要著作及资料有：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委会编《“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1957年7月，北京）、《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日运动》（1958年11月北京）、沈阳师范学院翻印的《“九·一八”前后之中国》（1957年7月）等。有关文章三十几篇，论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侵略，如孔经纬文《一九三一—一九四五年间日本帝国主义移民我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历史研究》1963年1期）等；（二）批判九一八事变期间美英等国曾经帮助日本侵略我国，如贾白文《“九·一八”事变中美国帮助日本侵略我国的罪行》（《江海学刊》1961年9期）等；（三）批判蒋介石政府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实行妥协卖国，如李退愚文《蒋介石反动政府在九·一八时期的卖国活动》（《史学月刊》1958年9期），等。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较多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而对事变本身，多数还缺乏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作深入的研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界面貌一新。九一八变变的

研究也有了新进展。1981年9月，在沈阳召开了九一八事变史学术讨论会，主要讨论了事变的起因及各国的态度等问题。它为九一八事变研究开展了交流。其后，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举办过几次学术讨论会，九一八事变都是会议讨论的重要课题。1985年8月，由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主持召开的战后日本四十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日本侵华史的角度，对九一八事变进行了探讨。

近十几年来，经过我国史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

首先，出版了几部专著。一是易显石等著《“九·一八”事变史》。这是第一部专门论述九一八事变的著作。1986年该书被译成日文，由日本新时代出版社发行。该书全面论述了九一八事变的过程，对中日两国当时的形势及各自的政策作了详细阐述。它一方面揭示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根源在于其既定国策和国内矛盾，另一方面也批判中国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断送了东北大好河山。书中对以往被忽视的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给予了高度重视，充分肯定了东北人民十四年抗战的历史功绩。该书注重选用中日第一手资料及战后新公布的材料。一是刘庭华著《“九·一八”事变研究》。此书从军事学和战争学的角度，对日军侵占东北的军事战略和战役企图，对日本关东军各时期的兵力部署和军事计划，详加叙述。该书还对九一八事变中日军将领和政府首脑等个人思想性格方面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该书有作者自己的独立见解，如不同意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计划是从1927年东方会议开始的，而认为，早在1911年日本就曾谋划侵占东北了。一是俞辛焯日文版的《“满洲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该书从外交关系这一侧面，对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中日关系进行研究，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此外，还出版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史》等书，与九一八事变也密切相关。

其次，发表了学术论文二三百篇。其中，关于九一八事变

与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问题，有王维礼的《论抗日战争的开端》（《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3期）、欧正文的《“二战”应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4期）、张锦堂的《抗日战争上限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5期）等。关于九一八事变史实问题，有沈予的《日本东方会议和田中义一内阁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高殿芳的《田中奏折并非伪作》（《军事历史》1985年3期）、邹有恒的《对蔡智堪取得田中奏章的质疑》（《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4期）、俞辛焯的《东方会议真相与田中奏折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85年1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83年1期）、谭译的《万宝山事件始末》（《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6期）、徐建东等的《“九·一八事变”肇事地名考》（《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2期）、易显石的《略论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近代史研究》1980年3期）、胡德坤的《“九·一八”事变与绥靖政策》（《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3期）、张敬禄的《评国际联盟在干涉“九·一八”事变中的作用》（《齐鲁学刊》1988年3期）等。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原因、背景问题，有董谦等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2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5期）、沈予的《评“九·一八”事变起因的“外部压力”说》（《近代史研究》1983年1期）、郎维成的《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年2期）、张锦堂的《日本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内幕》（《中日关系史论集》（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金相春的《日本法西斯化与侵华战争》（《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4期）等。关于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社会矛盾问题，有宋汝香的《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齐鲁学刊》1985年4期）、邱钱牧的《试论“九·一八”事变后民族

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转变》（《杭州大学学报》1982年4期）、王鸿宾等的《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1期）、温永录的《抗日战争若干问题探析》（《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2、3期）等。关于九一八事变中人物评价问题，有潘喜廷的《“九·一八”事变与张学良将军》、卞直甫的《张学良将军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5期）、王鸿宾等的《略论江桥抗日及马占山将军其人》（《北方论丛》1984年1期）等。

再次，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资料经过发掘、整理陆续出版。如《“九·一八”事变亲历记》（《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中华书局，1988年）、《“九一八”事变图片集》（沈伟一等编，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7年）。《“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该院出版社，1986年）。另外，中央及地方文史资料中也有一些关于九一八变变的回忆文章发表。对于国外学者研究九一八事变的情况成果亦有大量的翻译和介绍。如《满洲事变》（〔日〕关宽治、岛田俊彦著，王振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二卷）（中华书局，1981年，1982年）、《日本战后研究“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主要书目和论文索引》（张锦堂《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1年7期）。

二

近十几年来，我国史学工作者对九一八事变及相关问题的基本史实的研究取得相当进展，弄清了一些问题，并就一些问题展开争鸣。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目前我国史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确实存在《田中奏折》这一份文件。针

对“未见到原件”的观点,有的学者指出,战前日本重要机密文件“找不到”的事例,并非此一件,许多不利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文书曾被湮没。奏折的真伪不能以有无“原件”来确定。^①“存在说”的依据是:(一)有第一手材料证明奏折真实存在。^②(二)《田中奏折》的内容与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一脉相承。^③(三)《田中奏折》中提出的全球性战略思想,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思想的核心。(四)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这一阶段的历史发展绝非偶然,它的全部总和及其内在联系就是《田中奏折》存在的依据。^④另一种观点认为,东方会议制定了积极侵华政策,但东方会议后是否形成过《田中奏折》尚属疑问。有的学者根据现已掌握的档案,认为东方会议期间没有散发《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一文件。^⑤还有学者就两个问题提出问题:(一)所谓《田中奏折》本身存在着一系列错误和矛盾,且大都是硬伤,是奏章所不应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⑥(二)用以说明《田中奏折》存在的两份材料之间有许多矛盾是无法解释的。尤其蔡智堪的回忆文章,在关键问题上都是站不住脚或经不起推敲的。^⑦尽管对于《田中奏折》这一具体文件是否存在,学者们有不同看法,但东方会议制定了侵华战略方针,在这一点上大家的认识是共通的。

关于“皇姑屯事件”。有的学者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为武装侵占中国东北而制造这一事件,其目的有二:一是乘炸死张作霖造成东北政局混乱之机,以“维持治安”之名出兵占领东北。二是消

①② 沈予:《日本东方会议和田中义一内阁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

③ 赵连泰:《日本的大陆政策与田中奏折》,《北方论丛》1981年4期。

④ 甄容、师塔:《日本对外扩张的纲领——田中奏折》,《史学月刊》1983年5期。

⑤ 俞辛焞:《东方会议真相与〈田中奏折〉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85年1期。

⑥ 邹有恒:《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世界历史》1987年2期。

⑦ 邹有恒:《对蔡智堪取得田中奏章的质疑》,《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4期。

灭已无利用价值的代理人张作霖。这实际上是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一次预演。^①

关于“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关于这两个事件的发生,过去日本有人胡说这是中国制造“满蒙”危机的具体事件。我国学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侵略寻找借口而制造利用事件。他们以大量的档案资料详述了两事件的始末,揭露了日本蓄意挑衅,制造利用事端的罪行及险恶用心。^②但在事件的某些细节上看法存有分歧。如万宝山事件,有的认为是“日本间谍机关”制造的,有的认为是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制造的。关于中村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有6月说、7月说等。^③

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地点。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突出的进展,是对肇事地名的澄清。历来关于事变肇事地点的说法很多,有“柳条湖”、“柳条沟”、“柳河沟”等,莫衷一是。近些年来,我国学者根据中国地方志记载、地图和当时目击者的指认,以及日方的有关记载,考证肇事地点的地名应为柳条湖;对其他说法进行了考辨,说明了地名弄错并以讹传讹的原因。目前这一考证已获中外史学界承认。此外,对柳条湖事件爆发时间、铁路爆破部位及被炸的中国士兵尸体等也作了历史的考证。^④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发动者。史学界一般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统治集团推行大陆政策的侵略事件,但具体是由哪级机构哪些人物策划的,在研究中又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关东军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军部对关东军抱积极支持态度。^⑤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阴谋是由军部策划的,但方针

① 易显石,《“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王玉平,《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83年1期;谭译等,《万宝山事件始末》,《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6期。

③ 杨裕泰,《九一八事变若干史实辨正》,《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6期。

④ 易显石,《“九·一八”事变史》,徐建东等,《“九·一八”事变肇事地名考》,《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2期。

⑤ 张锦堂,《日本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内幕》,《中日关系史论集》(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

政策还是出自内阁。①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事变是由关东军的少数法西斯军人阴谋发动的，事后得到日本军部和内阁的承认和支持。②

关于伪满洲国建立。有的著作指出，事变前日本曾提出三种构想，一是将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二是扶植卖国集团，建立亲日政权；三是扶植傀儡，建立“独立国”。日本侵占东北后，选择了第三个方案，由土肥原贤二主谋，将溥仪挟持到东北，充当“满洲国”的执政。③也有人认为，伪满洲国的建立，既有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一面，也有溥仪甘当儿皇帝的一面。溥仪到东北，并非“挟持”，而是自觉自愿的。④

关于东北军民的抗日斗争。不少论著记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英勇的抗日武装斗争。东北各界民众、东北军官兵、东北义勇军等各种抗日力量，以多种形式，抵抗日军的入侵。⑤江桥抗战是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震动中外的战役。⑥此外还有文章对事变期间日本在东北的武装力量、东北边防军的情况、东北沦陷时间及“东北三省”的范围等问题作了史实辨正。⑦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国际反响。文革前，史学界多指责美英等国在九一八事变中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近十几年来，认识有所改变。一般认为：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默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但它与日本尖锐的利益冲突则决定其不可能也没有成为日本的帮凶，它由消极观望转向比较积极地与日对抗。⑧

① 郎维成：《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年2期。

② 刘庭华：《“九·一八”事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

③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 刘庭华：《“九·一八”事变研究》。

⑤ 易显石：《“九·一八”事变史》，王鸿宾等：《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1期。

⑥ 王鸿宾、王秉忠：《略论江桥抗战及马占山将军其人》，《北方论丛》1981年4期。

⑦ 杨裕泰：《九一八事变若干史实辨正》，《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6期。

⑧ 易显石：《略论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的态度》，《近代史研究》1980年3期。

英法两国持绥靖政策。①苏联的态度消极软弱，实行无所作为的“不干涉”政策。当时苏联国内正加紧经济建设，国防上尽量避免与外界纠纷，希望借美日冲突解除日本对其远东地区的威胁。②关于国联的态度，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传统看法，认为国联在英法操纵下实行绥靖政策。③另一种观点认为，国联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作了干涉，其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是逐渐强硬、步步紧逼的。日本退出国联是国联“逼”而不是“纵”的结果。不应过于单独强调英法对国联的左右，从而否定国联的作用。④此外，还有文章介绍了事变期间日本人民反战和支援中国的斗争。⑤

三

围绕九一八事变问题，史学工作者进行了深入的历史分析，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并进行了广泛的争论。现就几个主要争论问题评述如下。

关于九一八事变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史学界传统观点是“七七说”。近十几年有人提出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其理由是：（一）东北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变破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侵略东北就是侵略中国。（二）从战争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上看，从1931年到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是有机联系和持续发展的历史过程。⑥（三）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四）东北抗日战争是中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⑦如果轻视九一八变动的

① 汪文军，《“九·一八”事变期间英国的远东政策》，《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3期；徐蓝，《英国与“九·一八”事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6期。

②③ 胡德坤，《“九·一八”事变与绥靖政策》，《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3期。

④ 张黄禄，《评国际联盟在干涉“九·一八”事变中的作用》，《齐鲁学刊》1988年3期。

⑤ 朱守仁，《“九·一八”事变与日本人民反战和支援中国的斗争》，《中日关系史论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⑥ 张锦松，《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称呼问题》，《日本研究》1986年4期。

⑦ 温永录，《抗日战争若干问题探析》，《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2期。

后果,就会抹煞6年间中日民族矛盾这个历史主题。^①近些年来还有的同志提出,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其理由是:(一)它是法西斯国家日本侵略扩张的开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二)它是日本与美英等帝国主义争夺远东和世界霸权的“第一大关键”;(三)它反映了法西斯主义、其它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主要是苏联)的对抗;(四)它是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先导,此后又有了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和德意联合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②当然,对九一八是不是中国抗日战争起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尚有不同看法。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和背景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经济背景方面,一种意见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是它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最根本的原因;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是促使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原因。^③另一种意见认为,如果把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说成是九一八变变的直接原因,就无法解释遭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美国 and 德国为何未首先走上战争道路。应指出事变的发生植根于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危机之中,而不是世界经济危机之中。^④

政治原因方面,学者们提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推行大陆政策,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历史远因。^⑤东方会议后,《田中奏折》提出的全球性战略,是大陆政策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确定了首先“征服满蒙”的步骤。^⑥另外,有学者从国家体制角度,进行了

① 王维礼等:《论抗日战争的开端》,《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3期。

② 欧正文:《“二战”应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4期。

③ 何华国:《浅析“九·一八”事变的经济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4期。

④ 包奕斌:《论日本经济危机与“九·一八”事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2期。

⑤ 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⑥ 张雅丽:《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世界历史》1988年5期。

较为深入的分析，指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大陆政策的支配地位，它对事变的爆发起了关键和决定作用。^①

国际环境方面，学者们分析，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使英美等资本主义大国受到重创。它们正穷于应付，无暇他顾，这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了可乘之机；加上它们企图“祸水北引”，故而妥协纵容，也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嚣张的侵略气焰。^②

此外，有人从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方面，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原因进行探索，指出法西斯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内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战争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形成及发展至关重要，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所起作用显得更为突出。^③九一八事变即反映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本性。有的文章分析，九一八事变对日本国内建立法西斯专政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煽动了狂热的民族沙文主义；打击了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加强了军部与财阀的勾结；促进了急进法西斯运动的高涨；从而加速了国家法西斯化的进程。这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特点。^④

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史学界对此看法不一。一种意见认为，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但并未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理由有三：一是国民党政府同日本之间没有形成十分尖锐的对立状态，其他社会成分虽有抗日活动，但在当时的中日民族矛盾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二是美英等国同日本在争夺中国问题上矛盾虽有发展，亦未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三是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主要威胁来自国民党而不是日本，在一定时期内，日本的侵略带有局部性。^⑤另一种意见认

① 高二音：《“九·一八”事变发生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5期。

② 胡正邦：《一九三一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九·一八”事件的由来及其后果》，《思想战线》1983年4期。

③ 高兴祖：《关于日本法西斯化的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2月。

④ 张劲松：《试论日本法西斯主义形成的特点》，《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1期。

⑤ 宋汝香：《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齐鲁学刊》1985年4期。

为，中日民族矛盾是九一八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理由是：（一）日本占领东北，已经构成了对全中华民族的威胁。（二）中国共产党及红军虽然仍在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但其目标已开始转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了。^①（三）中日矛盾在中国社会中占主导的支配地位，东北抗日斗争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②

关于九一八事变有关人物的研究。现就几个主要人物的研究情况略作叙述。

对张学良的评价。以往的观点认为，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与蒋介石“一唱一和”，是不抵抗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对东北沦亡应负首要责任。近十几年来，许多学者依据大量史料，对张学良进行了重新评价，认为：（一）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前已有较强烈的爱国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思想和行动。皇姑屯事件使张学良身怀国恨家仇，渐与人民群众的反日思想产生共鸣，对日本采取了强硬态度：经济上，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对“满铁”等日本殖民经济实行限制政策；政治上，毅然在东北“易帜”，支持收回国权运动等反日斗争；外交上，采取“以夷制夷”政策，拉拢英美压制日本势力。（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不愿把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有抗击日寇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感到自己力量不足，所以产生依赖蒋介石，由蒋领导抗战的思想。结果多次指令东北前线：“绝对服从中央”，执行不抵抗政策。这是他的历史错误和终生憾事。（三）虽然张学良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对东北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还是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支援抗日义

① 唐志勇：《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看法》，《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2期。

② 李鸿文：《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历史意义》，《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3期；王希亮：《试论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及历史地位》，《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1期。

勇军的活动，对东北人民抗日斗争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①

对马占山的评价。马占山将军是九一八后抗日斗争中一个重要而有争议的人物。总的来说，近些年来史学界对马占山江桥抗日的义举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评价。争议集中在他降日的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他是真降而非伪降，说江桥抗战失败后，他在敌方威逼利诱和国内外援助无望情况下，逐渐丧失继续抵抗的信心，走上公开降日的道路。^②另一种观点认为，他的投降是一次成功的“伪降策略”。他以虚与委蛇、以屈求伸的伪降策略与敌周旋，没有做过一件有害于国家和民族的事。^③第三种观点认为，他的降日是“缓兵之计”，是伪降，但此举是他“政治上的失误”，是毫不足取的。^④

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研究。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侵华战略的必然结果，但具体的策划者和发动者，其魁首当推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许多学者评论说，关东军是急先锋，其中石原的阴谋策划和板垣的实际指挥起了重要作用。^⑤此外，还有人对桥本欣五郎、河本大作、大川周明等军国主义分子在九一八事变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① 潘喜廷，《“九·一八”事变与张学良将军》，《中日关系史研究》（二）。

② 于德有，《关于马占山一度降日问题》，《中日关系史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③ 王鸿宾等，《略论江桥抗战及马占山将军其人》，《北方论丛》1981年4期。

④ 刘邦厚，《评马占山的抗日活动》，《学习与探索》1981年5期。

⑤ 朱海举，《“九·一八”事变与石原莞尔》，《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5期。